

大學排名躍升 彰顯香港教育國際競爭力



近日，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公布2026年度世界大學排名，香港八所資助大學全數上榜，當中五所更躋身全球百強，成績令人振奮。香港大學位列全球第33名，穩居亞洲第六、全國第三；香港教育大學首次上榜即打進全球200強，嶺南大學亦首度上榜。這一系列亮眼成績，不僅彰顯香港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更反映出其背後的政策支持、科研投入與全球高教格局的深刻變化。

黃錦輝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 立法會議員

香港高校排名全面提升，建基於綜合實力的持續增強。THE指出，教學聲譽上升與師生比例改善是關鍵因素。更值得關注的是，香港高校在「國際視野」指標中表現尤為突出，平均分接近90分（滿分100），其中城大、浸大、理大、科大及港大更獲96分或以上，位列全球前25名。這種高度國際化的環境，源於香港積極吸引內地及全球優秀學生與學者，形成多元交融的學術生態。

特區政府長期對高等教育與科研創新的重視與投入，是香港高校崛起的重要支撐。例如，特區政府在2021年推出「傑出創科學人計劃」成為吸引頂尖學者來港的重要平台。截至今年2月底，已有66名「傑出創科學人」來港任職，分別加入6所大學，並帶來近220名研究團隊成員。港大與理大各吸納15名頂尖學者，最多人來自電腦科學及工程學領域，其次為醫療與生命科學、自然科學等。賽馬會透過其慈善信託基金捐贈5億港元，成立「賽馬會創科實驗室計劃」，資助來港學者成立實驗室，促進人才、硬件與資源的整合，推動前沿科研。

創科局亦提供「研究人才庫」資助，支持學者聘請研究員進行研發工作，截至今年2月底，計劃下有近220名研究員獲批資助。InnoHK創新研發平台則匯聚國際頂尖科研機構與本地大學，在醫療科技、人工智能、可持續能源等前沿領域開展合作。

以上多項措施不但提升香港專上院校的科研實力，更加強其國際交流經驗，促進本地師生與海

外頂尖科研機構的交往，有助香港高校進一步提升國際化表現，持續在全球高等教育舞台上發光發熱。

「東升西降」下香港優勢更顯

此次排名亦呈現「東升西降」的全球趨勢：亞洲高校持續崛起，中國內地、中國香港、新加坡及韓國的院校排名穩步上升；相對之下，美歐高校則面臨排名下滑壓力。美國大學尤其受挫，主要原因之一是特朗普政府對學術界的政治干預，包括削減經費、打壓「不聽話」院校，嚴重影響國際學者與學生對美國高校的信心。事實上，今年7月，美國持學生簽證入境的人數大跌28%，其中印度學生暴跌46%，中國學生減少26%，8月份更創4年新低。有美國教育組織預計，今秋國際學生的註冊率將暴跌四成，美國大學損失高達70億美元。

美國反覆無常的簽證政策亦打擊當地大學收生。最近，特朗普把科技界常用作招募海外人才的H-1B簽證費用，由約1千美元暴增至10萬美元，令企業難以負擔海外人才成本，打擊留學生赴美意願。要知道，美國大學向來廣納海外生，若學生畢業後留美工作機會減少，自然對選擇到美國留學有保留。

相比之下，香港憑藉開放、包容、自由的學術氛圍，吸引力大增。特區政府近年積極推動「搶人才」政策，成效顯著。香港在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公布的《2025年世界人才排名》中，由去年的第九位躍升至全球第四位，成為

亞洲第一，創歷來新高。當其他地區知道香港為人才高地，學生們自然更願意來港留學及工作。

打造國際教育與創科樞紐

面對全球高等教育格局重構與人才競爭加劇，香港應進一步發揮「一國兩制」下內聯外通的獨特優勢，強化橋樑角色。首先，持續優化人才引進機制，在吸引內地精英的同時，加大對全球頂尖學者的招攬力度，特別是那些因歐美政策收緊而尋求新平台的國際人才。其次，香港應持續深化政、產、學、研、投的協同合作，加快科研成果的轉化進程。香港高校的基礎研究實力已獲國際認可，下一步應加強與產業界的對接，促進創新成果落地，切實服務社會與經濟發展，為香港創科產業注入持續動力。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到，特區政府將推出「產學創科人才交流計劃」，為創科企業的專家進入校園教學創造有利條件，不僅促進大學科研與市場需求的融合，更有助提升科研成果的實際應用效益。此舉有望打破學術與產業之間的界限，推動知識轉移與技術落地。

目前，香港已成功引入大量海外創科企業。特區政府應積極擔當橋樑角色，促成本地大學與這些企業建立合作關係，推動聯合研發，既能提升科研水平，又能帶動本地經濟發展，可謂一舉兩得。若能與早前推出的「產學研1+計劃」互相配合，更可發揮協同效應，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創科樞紐的地位。

香港助力內企出海 提升中國品牌影響

邱建新 國際品牌科學院理事長 華豐國貨有限公司董事長

2025年9月17日，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特區政府計劃成立「內地企業出海專班」，以推動內地企業借助香港平台拓展國際市場。半個月後的10月6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見證「內地企業出海專班」正式啟動，標誌著這一重要舉措進入實施階段，體現了特區政府集結資源，吸引有意開拓海外業務的內地企業，利用好香港這塊寶地讓企業、品牌走向全球。

今年7月8日，首屆世界品牌大會在香港會展中心隆重開幕，眾多中國企業隆重亮相，展現出中國品牌在國際化進程中的強勁勢頭與巨大潛力。這些企業涵蓋多個關鍵領域，不僅代表了內地產業的先進水平，也為香港發揮「超級聯繫人」功能提供了重要載體。展望未來，香港需發揮優勢，努力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構建品牌盛事與交易體系

第一，推動「世界品牌日」在香港舉辦，並將其打造為每年一度的國際盛事。香港作為雙向開放的樞紐，是落實「世界品牌日」的最佳場域，其間可讓多地從事品牌的專家學者齊聚香港。我們期望通過此類高水準、高規格的國際交流平台，匯聚全球品牌智慧，促進中國品牌與世界對話，提升中國品牌的全球影響力與話語權，構建中西文化合璧並具中國特色的全球品牌生態。

第二，構建「世界品牌與知識產權交易」平台。回歸28年來，香港始終扮演助力內地企業國際化的角色。但隨着生產成本上升與競爭加劇，傳統的「前店後廠」模式已經過時，難以滿足新的需求。與此同時，香港擁有與國際接軌的法律制度和專業服務體系，能夠為品牌估值、產權保護、跨境交易提供緊密融合，雄厚資本力量支持，使品牌價值在規範透明的環境中實現高效流轉。未來在特區政府的引領下，國際品牌科學院將聯合各大商會，充分發揮香港國際化和法治健全的優勢，構

建安全、高效、可信的品牌及知識產權交易體系。

提供全方位出海支援

第三，確立香港「世界品牌中心」的核心地位。香港自開埠以來，已發展成為東西方商貿文明的交匯點，從維多利亞港灣的帆船貿易到中環金融區的燈火不滅，「亮閃全球、輻射四海」已成為這座城市的底色，在「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下，香港更有能力把握歷史機遇，將自身打造成為「世界品牌中心」與「全球價值鏈樞紐」，積極服務內地新興消費品牌「走出去」。近年來，包括特色餐飲、影視娛樂、專業服務及新能源產業在內的各類新興品牌不斷湧現，展現出蓬勃的創新活力與市場潛力。香港的多間世界級高校、國際商會與傳媒網絡，為品牌價值創造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土壤，加上日益強盛的祖國和聯通全球的市場支持，必將在品牌出海進程中發揮不可替代的橋樑與紐帶作用，成為內地企業進軍國際的重要橋頭堡。

第四，打造「一站式」品牌出海服務網絡。國際品牌科學院將選擇交通方便、家喻戶曉的場地，設立「中國品牌出海服務中心」，透過整合專業資源，讓內地企業少走彎路，降低試錯成本，提供從公司註冊、法律合規、稅務籌劃、秘書服務及財務管理在內的全流程服務。同時，我們將依託實體物理空間，打造一個集產品常態展示、線上直播帶貨、展會活動參與於一體的綜合平台，切實幫助內地優質企業入駐香港，繼而精準對接外海市場，走向世界。

我們堅信，在特區政府「內地企業出海專班」的積極引領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的制度優勢、專業服務和國際網絡將轉化為企業拓展全球市場的強大動能，讓香港成為內地企業走向世界的起點和國家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點，為全球經貿融合共贏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被抹殺的個體和被拯救的名單

陸相凝

反法西斯戰爭已經結束，但它在歷史與人心中留下的傷痕仍未完全癒合。這是因為，有些戰時悲劇還未得到正視，便已被史書和大眾遺忘。曾搭載着1,816名英軍戰俘的日本貨輪「里斯本丸」及其沉沒事件，就是其中一例。在《里斯本丸沉沒》繁中版譯本的新書分享會上，譯者王升遠教授提醒觀衆，這本書其實還有一個副標題——「英國被遺忘的戰爭悲劇」(Britain's Forgotten Wartime Tragedy)。不可否認的是，遺忘有時的確會發生在一些無足輕重的小事上。然而，里斯本丸沉沒卻並非一場不足掛齒的普通沉船事故。

被遺忘的海上悲劇

事實上，從犧牲人數來看，毋寧說這是一場比「泰坦尼克號」沉沒還要慘烈的戰時海難。然而，作者托尼·班納姆(Tony Banham)驚訝地發現，當今的大多數人對於發生在里斯本丸上的慘劇一無所知，彷彿那艘沉船和那些戰俘（無論倖存與否）都不曾存在過一樣。「當一艘船沉入海底，當一個人成了謎」，追問所愛之人為何離去便成了遺屬們的執念。為了逝者、更為了生者，重新發現、拯救並銘記那一段曾經被遺忘的戰時悲劇，成為了班納姆博士撰寫該書的心願，也同樣是該書同名電影的導演方勵，以及繁中版譯本的兩位譯者王升遠、楊惠迪接過記憶傳承接力棒的旨歸。而要揭開謎底，他們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便是——「這些戰俘是誰？在他們身上發生了什麼？」

歷史碎片中的生命印記

在書中，作者用大量來自倖存者及其家屬的信件、日記、口述材料以及後來撰寫的回憶錄文獻，重新拼湊起那個發生在香港淪陷後的悲情故事。不過，就事件經過本身而言，里斯本丸沉沒的始末其實並不複雜。1942年9月27日，里斯本丸駛離香港，計劃將船上搭載的1,816名戰俘全部押送至日本。然而，由於船頭配備火炮且船身

未標識船上載有戰俘的信息，里斯本丸被美軍潛艇「鱷魚號」識別為敵船，並於10月1日在中國的舟山群島海域附近被魚雷擊中。在船舶沉沒的過程中，由於日軍封閉了所有艙口，並對後來逃出船艙的戰俘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屠殺，至少有828名戰俘在此次海難中不幸遇難。

當然，班納姆並未停止對沉船事件始末的還原。毋寧說，他更在意的是一個個局中人的真實經歷與感受。根據書中所載敘述，戰俘們關心的往往是疾病、溫飽與離別等看似平淡的問題，而並不總會談論那些驚心動魄的體驗。但也正是這些一般人能夠感同身受的真切敘述，才賦予了這部歷史論著令人動容的力量。

不知其他讀者作何感受，但筆者總會在讀到戰俘書信中那幾為定式的「我一切安好」、「希望你們一切都好」時，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淚。在肉身受限、消息不通的戰時，讓承載着愛與思念的文字代替自己走出戰俘營、為遠在海外的家人帶去些許安慰，或許已是戰俘們最後能夠有所期待的精神寄託。只不過，生於戰後的筆者已經提前知道了故事的結尾，即便有些書信順利達送了，但那被牽掛着的寄信人卻還是不幸殞命他鄉；而那些倖存下來的戰俘也並未真正「倖免於難」——他們雖然躲過了炮火、捱到了戰後，卻還是被戰爭毀掉了原本平凡但幸福的生活。

至此，那1,800餘名登上了里斯本丸的戰俘早已不再是一個統計學意義上的抽象數字，而是意味着曾經真實存在過的人們以及具體生命的喪失——這也正是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者所輕視的。沉船前後，他們可謂對戰俘們極盡虐待、凌辱乃至屠戮之能事。即便是那些乖順服從卻因諸種原因死於非命的戰俘，日軍也並未給予其以生命最後應有之關懷，而只是「無情地把屍體直接拋入海中」，毫無人情與人性可言。或許在他們眼中，戰俘可以是工具、「人礦」以及與盟軍交涉的籌碼，卻唯獨不能被視作應當得到

尊重的、活生生的「人」。

從姓名開始的歷史傳遞

但正如譯者王升遠教授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所指出的那樣，「每個人在歷史中都應是重要且有尊嚴的，他們有權利擁有姓名。」如果說在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中，希特勒下令消滅的是一個籠統的、抽象意義上的種族，那麼辛德勒通過名單拯救的，便是一個個具體的人。而對於這場發生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期間的沉船海難來說，回答「他們是誰」的問題，也是在為那些被法西斯軍國主義者抹殺掉的、被宏大歷史敘事遺忘了的個體，尋找他們曾經存在過的痕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或許也正是因為每個人都有其具體的姓名，所以才是能夠被拯救和被銘記的。

當然，雖說讓歷史重新看見和記住那些具體的個人是作者與譯者共同的旨歸，卻不能僅靠他們來完成這一艱難的使命，還需要每一個人都積極地參與到歷史記憶的搶救與傳承中來。班納姆曾在《里斯本丸沉沒》的序文中感嘆，「『近2,000人』說起來倒是容易，但要凝視他們的名字和年齡（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已經死亡）卻又談何容易。」這事實解釋了「為何遺忘時刻都在發生」——因為「記憶」幾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情感乃至智性上的負擔，但並不是所有人都願意為之埋單。

如果一定要為歷史記憶的傳遞找到一個理由，那麼近些年在世界範圍內爆發的各種衝突以及各國民粹力量的抬頭，或許便是最為直接的現實依據。為了避免法西斯主義捲土重來、世界大戰再度發生，從關注里斯本丸沉沒這一歷史事件開始，你我都有必要做出力所能及的改變。不過，這並不意味着，作為普通人的我們必須做出什麼轟轟烈烈的壯舉。在筆者看來，「改變」恰恰指向了微小但可行的事情，哪怕只是多記住一個戰俘的名字，也是在改變我們立足的當下，而你我的參與本身，可能就已經改變了歷史。

推動增殖放流產業化 打造經濟新增長點

何俊賢 立法會議員



傳統民間放生活動常因缺乏科學指導，衍生「放生變殺生」亂象，更可能引發外來物種入侵、生態鏈失衡等嚴重問題。10月9日，漁農自然護理署聯同漁民團體、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代表，與一众中學生在印洲塘海岸公園進行增殖放流活動。立法會正就施政報告中的「無處不旅遊」提出建議，若能推動增殖放流與旅遊結合，或可開拓香港海洋旅遊新方向。

增殖放流透過嚴謹物種篩選與科學區域規劃，既能修復受損生態系統，又可提升漁業產量，促進海洋經濟的發展。以香港為例，每年6月「全國放魚日」期間，漁農自然護理署會舉辦增殖放流活動，邀請漁民團體、佛教人士、環保團體以及中小學生參與，再由專業潛水員將數萬尾魚苗放流到海岸公園。

調動資源 支撐可持續發展

然而，現時增殖放流活動仍屬於單方主導的保育項目，須依賴特區政府及團體（如機管局、海洋公園）的「捐贈式」資金投入，缺乏市場化運作機制，難以形成規模化產業鏈。這種單一資金模式雖保障活動運行，卻未必能夠支撐起長期可持續發展。

事實上，增殖放流產業化潛藏巨大市場空間。首先，不少香港市民有放生傳統，其次，環保團體、學校亦有其環保及教育需求。另外，香港坐擁東平洲、海下灣等海岸公園，憑藉清澈海域與豐富珊瑚礁資源，吸引不少潛水愛好者，為增殖放流項目的進一步普及提供空間。

然而，現行規管非法放生所用的《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舉證門檻過高，實際阻嚇力不足。若無有效規管，科學放生與產業化進程將受阻。特區政府應立法明確禁止非法放生，界定法律責任，並參照內地經驗制定物種、地點、方式等全流程科學指引，構建監管體

系，為產業化提供法律保障。

完善政策配套

政策配套方面，特區政府可透過基金資助等措施降低企業參與門檻，並通過多種措施推動公眾參與，加速產業化進程，例如，結合ESG評估體系鼓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推動學校將增殖放流納入課外實踐課程，提升公眾海洋保育意識。

參考日本、越南及海南省等沿海地區推出的「珊瑚種植+潛水」體驗，香港可將增殖放流與海島觀光、遊艇旅遊、休閒漁業、水上運動等旅遊業態結合，設計「增殖放流+」特色海洋旅遊路線，並引導企業參與旅遊產品設計及市場化運作，以打造增殖放流文化，吸引「回頭客」持續參與。同時，研究完善碼頭配套，如在屯門增設碼頭供遊客出海，以帶動地區餐飲、住宿、交通等產業共同發展。特區政府現時着力推展海島遊、深度遊，打造特色海洋旅遊產品，此舉或有助香港從大灣區濱海旅遊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

除旅遊業外，增殖放流還可為傳統養殖業的產業鏈延伸提供方向。一方面，可利用新海魚養殖區建立育苗基地，為日益增加的增殖放流活動提供魚苗；另一方面，可透過產學研合作培育更具適應性和抗病能力的物種，並結合本地海洋牧場進行規模化養殖，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經濟收益。依託香港自由港優勢，更可拓展魚苗及技術出口，為本地漁業發展開闢新方向。

總括而言，增殖放流產業化是海洋保育與經濟發展的雙贏策略。香港作為國際海洋都市，擁有獨特生態資源與科技優勢，透過科學規劃、產業融合及公眾參與，可推動社會各方共同參與，分擔海洋保育成本，帶動海洋旅遊、漁業轉型、生態保育協同發展，發展新質生產力，打造海洋經濟新模式，為全球海洋資源可持續利用提供「香港經驗」。